

—

走进上海滩

子孙桶里的编外余生

1908年我出生于宝山县罗店镇南乡，现为宝山区罗南乡，相距市中心区只有五十华里左右。但其时乡间思想闭塞，溺婴之风甚盛，我是母亲的第十胎，乡间医药卫生落后，在我之前的九胎中，存活的只有四个男孩，我母亲深受养儿育女的痛苦，所以决心不再保留第十胎。乡间全无妇产医务设备，接生都由产婆徒手处理，所以妇婴的安全是毫无保障的。我们乡里习俗，临产时产妇坐在一只专作生产用的便桶上，这就是结婚时新娘必备的一种全漆便桶，名为子孙桶，内藏红蛋枣子，作为早生贵子的口彩。妇女生产时，婴儿产下后，假使父母要保留的，那末由产婆把婴儿从产桶里抱出来放到另外一只盆子里去清洗打包。假使父母不要保留的，那末就把产桶盖起来，这条小生命马上就和父母告别了。这种溺婴之风，对女孩尤甚。

我父母原来决意要把我这个第十胎婴儿闷死的，可是我这个小生命似乎预感到一落地就要和父母永别，所以哭声特别响亮，接生婆又看到是个白白胖胖的小男孩，给我母亲一看就舍不得闷死，因之把我这条小生命保留住了。在机关中编制以外的人员称为编外人员，我的生命也是在我父母预定保留之外的，所以我自称为编外余生。

我的童年是在宝山乡间度过的，当时宝山是属于江苏省的一个县，我乡下老家是属于罗店镇的，这个镇是县里首富之区，被称为“金罗店”。我的祖居是罗店南乡的姜家宅，祖上素以务农为业。旧时乡村的公益事业无人专管，凡是修桥补路等事，全靠热心公益的人出面捐款兴建，我祖父就是这样的人，他吃了自己的饭，终年忙忙碌碌的为大众奔走。

罗店镇上有所善堂，专办收养弃婴和施衣施粥等慈善事业，经费由镇上绅商捐助，设有一位主持人是尽义务职，由于我祖父有了在乡下行善之名，取得了镇上绅商的信任，因之邀请他常驻主持善堂业务，从此他全心全意的为善堂工作，乡间农务由家人承担 他从中年起负责善堂工作 直至终老为止。

我祖父负责罗店善堂后，他同镇上的一般绅商建立了很好友谊，镇上读书人较多，当时有一位翰林和几位举人，其中有位举人施琴南设馆讲学，学生都是镇上绅商子弟，经那些绅商鼓励，我祖父把我父亲也带到镇上人馆就读。我父亲名文蔚，又名吉人 读书后考中了秀才 又拔了贡 以后清政府停止科举 改设学校 就没有再继续应考了。

“不为良相 便为良医”这是封建时代旧知识分子的传统思想，也可以说是不做官或做不到官的人的一种自我安慰的方法。我父亲进学后也自学中医，对妇科尤有心得，在乡间很有名望，一生即以教学和行医为业。在乡间行医不收诊金，本来是义务性的做善事，但乡人诚实厚道，病家痊愈了，总要送点土产为礼。旧时乡间读书人很少，因之凡是文墨上的事情，如写田地卖买的文契，办理婚丧喜庆做帐房等事，总要请读书人帮忙，因之我父亲就为这些事情而忙碌。还有民间纠纷，乡人也要上门诉苦 请求主持公道 我父亲为人谦和公正 对人做事 总以情理为

主 遇有纠纷 总是劝人和解了事 避免了好多官司。俗语说“衙门八字开 有理无钱莫进来”乡人打官司 免不了双方破财甚至于破产而告终。我父亲劝导人家和解而免予涉讼，深得乡人的信任和尊敬。旧时乡间还有武斗，遇有二村纠纷，双方都以刀枪相拚，当我五六岁时，我见到过乡民数十人到我家来，各带红缨枪或木棍，准备同邻村械斗，我父亲叫他们不要轻举妄动，经他出面同对方商谈，解决了争论问题，从此二村和睦相处。

辛亥革命后，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了议会，宝山县也设有县议会，罗店镇称作市，设立市议会。我父亲出任县议员兼罗店市议会议长。其后议会取消，罗店镇改设董事，我父亲也由议长变为镇董。

议长也罢 镇董也罢 都是所谓‘民意机关’的代表 光揽活不支薪。长此以往，家用不敷，父亲便起了到外面谋事的念头。大概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的光景，他由宝山的一位基督教蔡姓牧师介绍，前往上海当家庭教师去了。当时的我，还是一个在乡间水车大轮盘上跳上跳下的顽童，不曾想到这一个过门，也会同我日后在宦海浮沉不定的生涯发生某种联系。

“国舅”的家庭教师

父亲执教的东家姓宋，起初只晓得他是蔡牧师的好友宋牧师 以后才知道 宋牧师就是“国母”的父亲宋耀如先生。当时宋氏全家刚从日本返沪，住在虹口东余杭路。

宋耀如生有三男三女，其时大的四位子女都已出国，只有两位小男孩在家，就是宋子良和宋子安。我父亲专为他们补习国

文。和宋家比邻而居的，是时任留美学生监督的黄佐庭，结果他的孩子也来听课，使我父亲又增加了一份收入。

据我父亲讲，宋耀如为人厚道，态度随和，毫无富商架子。夫人倪桂珍出身名门，知书明理，贤惠慈厚，对子女管教颇严。我父亲在宋家数年中，也耳闻目睹了一些。

宋霭龄是宋家的第一个女儿，个性强横，完全和母亲相反，稍长就和母亲顶撞，平常调皮捣蛋，在几个弟妹中她是皮王。她们家住东余杭路，其时邻居还有种田的，她带着弟妹从后院翻过墙壁，跑到人家果园里从树上摘下未熟的青果，到稻田里去捉青蛙和小鱼，把秧苗都踩坏了。有次看到一个大南瓜，她用小刀子挖了个洞，叫子文拉屎在里面，重新盖好，人家不知道里面有屎，摘下来抱到家里才发现。她们的恶作剧太多了，邻居忍无可忍，只好到她们家里去告发诉苦。倪桂珍为人忠厚，一面向邻居道歉，一面把霭龄叫来严加训斥。可是宋耀如刚巧回家听到了，不加训斥，只是拿出几倍的钱来赔偿邻居，并且说，以后如有这种事情发生，一定拿重金来赔偿。如此等于放纵他的儿女去糟塌邻居的农作物。宋霭龄的这种调皮捣蛋的性格，遗传给她儿女，同样的大肆捣蛋。如她的二女儿孔令伟（人称孔二小姐），抗战时期在重庆是有名的捣蛋鬼。

宋庆龄排行第二，在三姐妹中最为秀丽文静。我父亲在宋家任教的前期，曾见她回家住过一段日子，待人谦和有礼，很有气度。其后忽然又到日本去了。过些日子，才知道她与孙中山结婚了。后来有一些传述宋庆龄婚事的文章说，她父母反对她和孙中山结婚，尤其是她母亲，坚决不同意，以至把她软禁在家中，后来她逃出家门去日本结婚的。可是我父亲讲，毫无“软禁”印象，更谈不上什么“逃出家门”。至于她和父母间究竟有无争

执，这是东家的家庭秘密，自然就不是西席所得与闻的了。

给我父亲留下最深印象的宋氏成员，自然是那子良和子安两个受业弟子。当时宋家已很富裕，有私人汽车，生活阔绰，所以这两位打扮举止在我父亲这种老夫子的眼里看来，就成了“花花公子”。其实也就是洋派一点罢了。作风上绝无不检点处，对老师也很尊敬。宋子良毕业于美国凡顿贝特大学，抗战前在上海官商合办的中国国货银行当总经理，我到银行里去访问过他，只是一般性的见见面，并没有什么事情相商。谈到我父亲在他家里当家庭教师教过他国文，他说记得很清楚，说是“老先生教书很认真，今天教了一课，明天还要叫我们弟兄俩背出来。”说着哈哈大笑。他对我很客气，还以师兄弟相称。他比我年长十岁左右。抗战初期，他当了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主任。总处设在昆明，专运进口军用物资的，在重庆设有办事处，由我负责。不过我是1940年进去的，其时他已去美国治病，主任职务由副主任陈体诚代理，我不是通过他的关系进去的。抗战胜利后在美国病故。宋子安我没有见过，他的情况我不了解，仅听说后来也去美国留学，好像是在哈佛。

宋耀如虽然先后把六个子女都送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其实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很重视的，专门聘请我父亲这样一个前清秀才来家授业，就是一证。宋家三个大孩子在出国前，都受过这方面的良好教育。例如宋子文，相传他当财政部长时，爱看英语呈文，有人便当他在国学方面一窍不通。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父亲就听耀如先生讲过，宋子文在上海读圣约翰大学预备班时，于中国古书上下了不少功夫。看起来爱不爱 and 懂不懂是两码事。

父亲是在宋子文和宋美龄相继回国前离开宋家的。在此之

前，有过要给宋美龄找一个国文教师的讨论。因为三姐妹中，只有她在年纪很小时便去了美国，缺少中国文化的熏陶，而在宋耀如夫妇看来，这一课非得补上。不知是我父亲自认资格不逮，还是个性要强的宋美龄不屑在两个弟弟之后“进山门”结果是他终究未能留下来再当一回宋美龄的家庭教师。但就是这条连贯不起来的“师”、“生”线索，日后竟帮了我一次大忙。

父亲离开宋家后不到两年时间，宋耀如先生去世了。不是基督徒的父亲是否参加了东家的葬礼，我已没有印象，但此后不时听见他以尊敬和惋惜的口吻谈及宋牧师。

和刘华烈士同学

从我罗店镇乡下到上海市区，约有五十华里，这两个相距不远的地方，却完全是两个世界，精神面貌和物质享受，完全不同。每当太阳西沉，夜幕升起后，从乡下南望，桔红色的光辉，笼照着半片天空，作为乡下人，无不向往着这个意想中的人间天堂。可父亲难得带我到市区来玩一趟。来玩了真是欢喜若狂，回乡时还要在小朋友面前把上海吹嘘得天花乱坠。1921年，我二哥到上海来创办私立文蔚小学，我在乡里已经读过国民小学，就跟他到上海来读高小，从此定居上海市区。

文蔚小学设在哈同路民厚南里，隔开一条安南路，还有民厚北里。这些里弄房子，东起哈同路，南至福煦路（现延安西路），西邻英商电车公司，北达静安寺路，当时是上海里弄房子中可算最大的了，是哈同的产业。在这处里弄内，居民各行各业都有，所以学生家属的职业各异。其中还有封建旧家庭，把孩子上学

看作大事情，家长陪着子女来上学，带了香烛，供奉在孔夫子画像前，向孔子三鞠躬，也要向老师行礼。

在民厚里内我看到个特殊人物，他穿的是日本和服。有时他带着他的夫人和孩子一起进进出出，他们全家人都穿和服。当初我以为他们是日本人，多年后我才知道他就是郭沫若，其时他刚从日本带着全家回国。

我三哥从北京邮电学校毕业后，派在上海电报局工作，也住在民厚里。他把我三嫂从乡下接来上海，我就跟他们共同生活。晚间他在文蔚小学内附设了一所英文补习学校，学生大多是职业青年，我也就近补习英文。

中华书局印刷厂设在哈同路之西，静安寺路之北，厂里有不少职工住在民厚里，其中有好些年轻职工到我三哥所办的英文夜校来读书，因之我同他们成为同学。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日后以工人运动领袖名垂青史的刘华烈士。

刘华身材较高，脸形瘦长，生活很俭朴在衣着上，他终年穿着竹布长衫，天气寒冷时是深蓝色的长衫，天气暖和时是淡灰色的长衫。衣着虽朴素，风度很潇洒。在饮食上，当时有不少私人经营的包饭作，供应以月计费的伙食，一般职工都吃包饭，刘华亦不例外。但他很忙，有时错过了吃饭时间，就以大饼油条充饥。有的同学觉得他这样吃法太寒酸了，刘华却毫不在意，我行我素。

刘华从不缺课，每天总是早早就来到教室里自习。他平时沉默寡言，但当同学有困难时总能热情相助。他学习很刻苦，见有同学不懂时能给予帮助；劳动上也是如此，因英文补习班是我在电报局工作的三哥开办的，所以每天下课后我总要打扫教室，刘华经常留下来帮我打扫完教室才走。

我高小毕业后考入南洋大学附中读书，以后直升大学本科，刘华也于 1923 年夏季进入上海大学附中半工半读。1925 年“五卅惨案”发生，南洋大学和上海大学的学生纷纷上街游行，我们附中学生也参加了。我在游行时很留意上海大学的学生，很想在此与刘华重逢，可是没有见到他。后来才知道，原来刘华也是“五卅”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那时他已去沪西工人集聚地从事工人运动。

刘华被害的消息我很迟才知道，当时我真为自己失去了这么一位好同学感到痛心。如今，我亦已是 90 岁的老人了，但刘华仍然活在我的心中，还象当年我们同窗时一样的善良、真诚……

“狗与华人不得入内”!

高小毕业后，我考上了江苏省立商业专门学校，校址在小南门附近。我所以投考该校原因，由于校中训育主任钟玉良是我二哥在宝山师范读书时的同学，便于请他照顾我的学习。钟玉良身体强壮，讲话声音宏亮，辛亥革命后一度实行征兵制度，他和我二哥一起当过兵，颇有军人气质，因之他对学生管理，也有严格的要求，尤其对于一些调皮捣蛋的学生，不怕麻烦的同他们打交道。

旧时学制，中学是四年毕业，商专也是四年，等于现在的中专。我只读了一年，以后投考了南洋大学附中。钟玉良是浦东高桥人，他的年龄比我大十多岁，原来我们是师生关系，抗战胜利后我们变成了同事。因为他当了高桥区区长，我当了老闸区

区长。

我是乡下人进城，到了市区以后，一切都感觉到新奇，所以总想到处去看看。尤其哈同花园和我家里只有一路之隔，看到这样的一所大花园，在它红墙里面，究竟有些什么花样呢，这是老活动在我思想中的一个谜团。但是这个私人花园是不开放的，所以无法入内。以后知道，遇有哈同夫妇养子结婚，可以凭柬入内观礼。刚巧我二哥有位罗店镇的同乡朋友，他在哈同洋行里当经租帐房，送过几次观礼请柬来，因之我跟我二哥到花园里去玩过几次。

哈同路不远就是静安寺，这是我常去游玩的地方。其大门前马路中间有口泉井，称为“天下第六泉”，原为静安寺八景之一。静安寺每年浴佛节举行一次庙会，庙宇附近四周设摊出售各种商品，非常热闹，名为摆摊会，约有十天。

我初来上海时，在静安寺西首，就是后来的百乐门舞厅原址，我看到一块界址石碑，就是公共租界和华界的分界处。

中国工人把上海租界建设起来，享受的是外国殖民主义者，中国人非但不能享受，而且处处想法来侮辱中国人。如在外滩公园大门口挂起一块“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木牌，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当二十年代我到上海读高小时，初次到南京路外滩游玩，看到黄浦江里停着许多大轮船，起初觉得很好看，但仔细一看，都是挂着外国旗的外国轮船，而且还有不少外国兵舰，我不由得奇怪起来，黄浦江不是租界，为什么也是外国人的天下。

从南京路外滩沿着江边向北走，走到尽头是一所花园，花木茂盛，那时外滩只有这一方绿化地，因之我向着它想要走进去看看。可是一到大门口，有个印度巡捕挡住了许多人不让进去，他

手指一块木牌子，讲着中国话，说是“中国人不可以进去的”。我往前一看，木牌上写着“狗与华人不得入内”字样。外国人不但把中国人和狗并列，而且还排列在狗的下面，那时我虽是一个小孩子，但已经读了高小，也懂得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尤其要保持一个中国人的尊严，所以感觉到了受人侮辱的心痛和气愤。当时，我跟着有些人向木牌和印度巡捕怒目而视，更有人高叫“把木牌拿下来”。印度巡捕就挥舞手中警棍，把聚在公园门口的观众赶散了。

离开外滩公园，返身南行，到了轮船用的码头上，有些外国水兵上岸他们看到了中国姑娘就动手动脚的调笑。有的手里拿着根小鞭子用鞭子敲着人力车，跳上车去叫车夫赶快跑。

在外滩步行，看到外滩公园西首对面有所花园洋楼，屋顶上挂着米字旗，那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的领事馆。当时它是殖民主义者的权威。在外滩还有几家外国银行和洋行，进进出出的人，大多数是高鼻子黄头发的西洋人。他们走路都望着天，我体会到了“目中无人”这句话的意境。

殖民主义者处处要侮辱和贬低我们中国人。如租界里的电车，只有头等和三等，而没有二等。为什么？他们开办时，原来头等是预备给他们外国人乘坐的，三等是给中国人乘坐的。他们把中国人看作三等民族，连坐二等都不够格。帝国主义心目中的二等民族是谁呢？就是被他们奴役的殖民地人民，用来作为租界里的巡捕，迫使这种巡捕来管制中国人民。

旧中国的外国租界，是帝国主义对被侵略者的屠场，是殖民主义者享乐作福的安乐窝。同时也是劳动人民流血流汗甚至牺牲生命的地狱。我是从旧中国过来的人，切身的有此体会。

二

“南洋”风云录

缅怀陈虞钦烈士

1924 年秋，我考入了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大学，从附中读起 直升大学。

南洋大学校址 大门设在海格路(现华山路)南为虹桥路，西与北二边其时还没有马路。校园约近二百亩，四周围以河浜，除了东边的大门外，其他没有别的出路。校址在华界，而海格路和虹桥路都是越界筑路，遂被租界工部局所管辖。大门为牌楼式木结构，颇具古色古香的情趣。进了门有条马路，大门北首有间传达室 马路南边 首先有道竹篱笆 内有平房一所 那是教职工子女的幼儿园。再往西，有一所附属小学，内有操场和几所二楼教室，完全和大学是隔开的。学生公开招收，但毕业后可直升大学附中。

大学和附中是在一起的，以大操场为中心，四周围以马路，马路旁边是各种建筑。大操场东边是所三层楼的图书馆，我入校时建筑不久。图书馆北边有几所单幢的小洋房，那是校长和教授的宿舍。操场北边有二所教学大楼，东面一所称为中院，那是附中用的，其底层有个大饭厅，此外房屋作为办公室和化验室，二楼是附中的教室，三楼是宿舍。大楼后面有一排二层楼房子，底层作理发室、老虎灶和浴室，楼上是宿舍。再后面有所二

层楼的四合院，称为新中院，也是宿舍。中院西边的一所教学大楼称作上院，那是大学用的。底层有所大礼堂，名为文治堂，是纪念老校长唐文治的，有五百多个坐位。底层其余房间为办公室和化验室。二楼是教室，三楼是宿舍。上院后面有几所实习工厂，还有网球场。上院西部有一排二层楼的宿舍，名为西宿舍，建筑较新，是大学部的高级班同学住的。西宿舍前面有所单层的风雨操场。

大操场西边有所三层楼高的体育馆，我入校后新盖的，是钢管水泥的建筑。底层有个大厅，可供会议用，后面是淋浴室。连着体育馆有个裙房格式的单层游泳池。体育馆二楼有个篮球房，三楼只有沿着墙壁建的跑道，中间是空的，就是二楼篮球房的屋顶，体育馆面积不大，只有上述一些设备而已。体育馆南边有所旧房子叫做南宿舍，是教职工住的。改为交大以后，在体育馆西边又盖过一所二层四合院，格式较新，称为新宿舍，面积较大，是大学部用的。在南宿舍西边，还有所二层楼的医务室，也是在我入校后新盖的。

大操场南边与附小间隔的中间，是一片花园，南洋大学发起创办人盛宣怀的铜像便安置在此。但更令我萦怀难忘的是，这里还矗有我最要好的同班同学陈虞钦烈士的纪念碑，他是在著名的“五卅惨案”中为国捐躯的。

陈虞钦原是南洋群岛的华侨，出于爱国热忱，同他哥哥陈虞添一起回国来考入南洋大学求学的。他活泼可爱，勤敏好学，在班级中是个优秀学生。他的哥哥陈虞添是学校里的足球健将，以后他又参加上海著名球队东华足球队，是个前锋名将。毕业后他一直为祖国服务，解放初期我听说还在上海。陈虞钦为国牺牲后，全校师生同声悲痛，特为在此立碑纪念，遗体安葬在虹

桥路万国公墓(现宋庆龄陵园)每逢“五卅惨案”纪念日,全体同学步行到此凭吊。当时同班中还有位胡恒慈同学,惨案中受到过度刺激,造成忧愤而死。

五卅惨案亲历记

“五卅”是我亲身经历的一次反帝爱国运动。

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被日本资本家枪杀,激起全市人民反帝怒潮。

5月29日,上海学联决定,各校于5月30日停课一天,发动学生参加反帝示威游行。当天晚上,南洋大学学生会召开全体同学紧急会议,我和陈虞钦等几个要好同学联袂前往。大会在上院底层的文治堂举行,本来只有五、六百个座位的大礼堂一下子坐满了,后来的同学坐到窗台上去,窗台坐满了又立在二边过道上,整个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充满了热烈情景,大家急于要知道召开紧急大会的内容,鼓掌催促开会。当时学生会领导成员中,有李宣誉、费振东、张永和、顾毓琇、骆美轮等。

大会开始,主席宣布讨论内容是关于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领袖顾正红案件后,顿时大家就感到震惊而显出怒形于色的神情。首先请上海总工会副主席刘华,到会报告顾正红惨案经过,刘华的报告慷慨激昂,义正词严,激起沸腾情绪,当即决议:(一)全体同学节约伙食菜金二百余元,捐献支援罢工工人。(二)5月30日停课一天,上南京路游行、演讲、示威。由于公共租界巡捕参与镇压罢工工人,所以到南京路去游行示威的目标是工部局的市政厅。